
抗日战争史研究的硕果

——军事科学院编《中国抗日战争史》评介

王 淇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最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和世界政治格局的演变,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撰写一部全面系统地反映这场伟大民族解放战争的著作,对弘扬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促进祖国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富强,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写的三卷本《中国抗日战争史》(共150多万字),在纪念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已全部出齐。这是一部有份量的抗日战争史学术研究专著,它包含了众多学者多年辛苦耕耘和心血。为了保证质量,丰富内容,编著者分工专人核对史料,绘制地图,花了很大功夫。这部著作规模宏大,内容丰富,它以鲜明的立场、清晰的脉络和翔实的史料,展现了本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各族各界民众反抗日本侵略的那场艰苦卓绝、气壮山河的民族解放斗争,给人厚重的历史感和深刻的启迪。这是近年来抗日战争史研究深入发展的一个硕果。

首先值得介绍的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一书的结构布局和指导思想。全书共分3卷6编:上卷(1931年9月18日—1937年7月6日)为第一编“东北沦陷”,第二编“救亡高潮”;中卷(1937年7月7日—1940年12月)为第三编“举国抗战”,第四编“转入相持”;下卷(1941年1月—1945年9月)为第五编“渡过难关”,第六编“走向胜利”。在这样的结构布局中,作者注重把握以下三大关系的发展和演变:中日关系,国共关系,中国抗战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

关系。用作者的话来说,就是“力图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角度,探讨中国抗日战争从局部抗战到全国抗战的进程和规律,全面反映正面、敌后两个战场的军事行动,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等各方面的情况”。

此书上卷,在论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时,以大量确凿的史料,揭露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称霸亚洲的“大陆政策”的形成及其实施。从1927年田中义一内阁召开“东方会议”,确定先侵占“满蒙”,然后向中国内地扩张的《对华政策纲要》起,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1931年制造九一八事变,强占中国东北;1932年制造一二八事变,进攻上海;1933年侵占热河;1935年制造一系列分割华北的事件。与此同时,日本军部制定并逐年修订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兵纲要》。书中详细记述的这些事实,在政治上是对日本政界少数人企图为日本军国主义涂脂抹粉,为其侵略罪行翻案的有力驳斥。此书还认为:日本军国主义以制造九一八事变为起点,发动对中国的武装进攻,“迈出了独霸中国、争夺亚洲、称霸世界第一步,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奏”(上卷,第3页);而1937年7月中国全民族抗战的爆发,“实际上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由局部战争向全面战争的转折点,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全面爆发的起点”(中卷,第392页)。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问题,传统的说法,是以1939年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作为世界性大战开始的标志。这个问题在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该书所持的新观点,是他们的一家言,可以探讨。另外,书中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于帝国主义国家集团之间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讲得较清楚,但对德日意法西斯势力同各国反法西斯势力这一世界主要矛盾的形成,则论述不够充分。

《中国抗日战争史》一书最突出的特色,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有较充分的论述,尤其是对解放区战场的开辟、发展和反攻,写得较好,且有新意。试举以下几点,略加说明。

1、关于抗日战场上红军的战略方针和军事战略转变。书中指出：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总方针，是红军贯彻执行全面的全民族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的唯一正确方针。只有独立自主地进行分散的游击战争，才有利于发动、组织群众，开辟广阔的敌后战场，进行全民族的抗战，置日本侵略者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因此，在抗日战场上，红军必须把国内革命战争集中使用的正规军，转变为抗日战争分散使用的游击军；把国内革命战争的运动战，转变为抗日战争的游击战。这样才能同敌情、友情、我情以及新的战略任务相符合。这一军事战略转变不仅关系着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前途，而且极大地关系着整个抗日战争的坚持、发展和胜利，关系着中国民族解放的命运。”（中卷，第59页）因此，轻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在华北，八路军战略展开的第一个步聚，是在山西省四角山区站稳脚跟。然后，实行大幅度分兵，一方面扩大山区根据地（绥远大青山区、晋冀豫太行山区、冀热边山区等），同时向平原（冀、鲁、豫北）发展游击战争，并创建抗日根据地。“平原与山区根据地相互依存，相互策应，形成了广阔的华北敌后战场。”（中卷，第132页）在华中，新四军组建后，逐步从皖南、鄂豫边向苏南、苏北、豫东、皖中发展游击战争。这样，就出现了战争史上的伟大奇观：“我军主力气势汹汹地向中国腹地进攻，八路军迎敌而上，向敌占区挺进；日军在正面不断占领新的地区，而在后方却不断丢失占领的地区。”（中卷，第392页）敌后战场的开辟，“极大地钳制了日军的作战，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加快了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中卷，第392页），为最终战胜日本侵略者创造了条件。

2、关于“百团大战”。这一章整个说来，写得很好。第一节，讲“战前国内外形势”，着重说明当时欧亚战场的不利态势。希特勒德国横扫西北欧，法国战败投降，英军落荒而逃（敦克尔刻大撤退）；日本在加紧围困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同时，发动枣宜战役，占领入川门户宜昌，又策动迫使重庆政府屈服媾和的“桐工作”计划；英国迫

于日本的压力,决定封锁滇缅路三个月;蒋介石陷入开战以来从未有过的惶恐境地。说清这些情况,在事实上回答了八路军对日军发动大规模交通破击战在军事上、政治上的意义和必要性。把“百团大战”的发动,放在1940年夏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欧亚战场的战局进程中来论述,这一着眼点很好,与编写《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2)》时相比,可以说前进了一步。第二节,重点突出,叙事清晰生动,详略得当。第三节,对“百团大战”的积极影响及战役指挥上的缺点这一有争议的问题的评价,也较准确。编著者认为:“百团大战”沉重打击了敌华北方面军的“囚笼政策”,“对粉碎日本威压诱逼中国政府迅速屈服的狂妄企图发挥了重要作用”,并推迟了日本的南进步伐,“百团大战”提高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声威,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是抗日的中流砥柱。在“百团大战”中,华北抗日军民取得并积累了大规模作战的经验,经受了严峻的锻炼和考验;但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付出了重大的牺牲和代价。“百团大战”由于战役规模和持续时间,都超过了部队和根据地补给能力的限度,部队消耗过大,在日军报复“扫荡”时,已相当疲劳。因此对日军打击不力,使根据地遭到严重的摧残和破坏,加重了以后的困难。以上这些评论,是恰当的。(中卷,第623—625页)

3、关于解放区战场的局部反攻。本书编著者认为,1943年7、8月间,冀鲁豫军区和一二九师进行的卫南、林南战役是1944年各解放区军民普遍开展攻势作战的“节奏和序幕”,“它标志着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出现根本转折的同时,中国战场由于日军的衰败和敌后军民的发展壮大,也出现了新的转折,解放区战场已逐渐由战略相持阶段,向战略反攻阶段过渡”。(下卷,第329页)这里表达的观点,是颇有新意的。当然,说有新意并不等于没有讨论的余地。事实上,据我们所知,在对解放区战场的地位和作用的评价上,或多或少,有些不同的看法。此书编著者认为,相持阶段到来后,从对日军战略反包围态势的形成,从抗击日伪军频繁进攻和对日伪军

积极作战等方面来看,敌后解放区战场逐渐成为全国抗战的“主战场”。(中卷,第629页)有的学者持另一种观点,认为国民党正面战场一直是全国抗战的“主战场”。还有的学者认为,相持阶段到来后,敌后解放区战场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正面战场的地位有下降的趋势,但还不宜作主次之分;两个战场互相依存,互相支援,缺一不可。有不同认识,是学术繁荣的表现,相信通过继续深入的比较研究,可以达到接近历史的真实。

撰写全民族抗日战争史,必须对国民政府的对日态度及相应措施和对国民党正面战场在抗战中的地位、作用及变化,作出符合历史实际的评价,使读者更好地了解我们这个民族的强点和弱点。该书编著者在这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与过去的同类著作相比,可以说有所前进。例如,上卷中指出: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国民党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是采取妥协退让的不抵抗主义方针的。到了1935年,不少国民党领导人深感亡国无日,蒋介石集团虽然没有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但确已着手抗战的准备。除成立国防决策机构,拟定国防作战计划外,还整建陆海空军,修筑国防工事,筹划国防经济建设和交通建设(包括修滇缅公路),等等。在中卷中,以较多的篇幅叙述了全国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对外对内政策中表现出的新气象,军事上组织了忻口(太原)会战,淞沪会战,徐州会战(取得台儿庄大捷),武汉会战;同时,对政治、经济、文化进行改革,组织大批工厂内迁。过去综合性抗战史对国民政府在经济方面的建设及改革的措施和建树,讲得很少,或根本不提。至于工厂内迁,过去的著作多称赞政治上进步的企业家所做的努力,实际上,如书中所说,此举主要是由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财政部、军政部、实业部联合筹建监督委员会(以资源委员会为主办机关)组织实施的,并提供搬迁经费和运输车船,及实行其他优惠政策。

书中对相持阶段到来后,国民党召开的五届五中全会(1939年1月)没有简单地说它是“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开始的标志,

而是采取分析态度,认为五届五中全会在抗战与党务问题上,“表现出积极与消极方面交相并存的双重性”。在抗日问题上,五届五中全会基本上坚持了继续持久抗战的立场,蒋介石在开幕词中明确反对按照近卫声明的条件妥协求和,但并未断然排除与日本谈判媾和的可能性,问题在于什么样的时机和条件,表现了其抗战目标的局限性。在党务问题上,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重视自身的建设和发展,无可非议,其目的或含有适应抗战需要的考虑;但这次全会把中国共产党力量的发展壮大及其在全国政治影响和地位的提高,视为国民党自身颓势的一个原因,唯恐中共在抗战中“坐大”会危及国民党对全国的统治,从而确定了“限共、防共、溶共”的错误方针。慑于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无法抹杀,全国同胞要求国共两党团结抗战的呼声非常强烈,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采取的是“既合作又限制的双重政策”。以上的分析笔法,是书中的精彩之处。书中还指出,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对内政策的倒退逆转,对中国抗战事业产生了极其严重的恶劣影响。此后事态的发展,正是如此。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摩擦事件不断升级,甚至发展到消灭皖南新四军这种亲痛仇快自毁长城、使国共关系濒临破裂边缘的地步。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才维护了全国抗战大局。书中对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第一次和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斗争,作了如实的记述。

军事方面,书中对正面战场敌我攻防态势论述清晰,内容也较充实,肯定了正面战场的战绩。指出:“中国第三、第四、第五、第九战区部队,对日军的有限攻势进行了有力抵抗,并于1939年对日军展开了冬季攻势,先后取得长沙、昆仑关及五原等地作战的胜利。”(中卷,第519页)还值得提出的是,该书以较多的篇幅记述了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在缅北、滇西的反攻作战,并高度评价了这次反攻作战的重大意义:1、支援了国内正面战场的抗战,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斗志;2、创造了中国近代历史上中国军队在异邦国土打败侵略者的前所未有的辉煌战绩,赢得了世界人民的赞誉;

3、有力地支援和配合了盟军在印缅战区和太平洋地区的作战;4、动摇、瓦解了日军对缅甸的统治。这些评价见符合实际的。

在抗日战争史的研究中,民族解放战争同中国社会变迁和社会进步的关系的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此书亦注意及此。编著者对抗战时期三种地区(解放区、国统区、沦陷区)的三种不同性质政权的社会状况,在有关章节中,都有所叙述。但目前的模样,深度和广度不够;对有些问题(如官僚资本、四大家族等)的量化研究,也显不足。不过,书中对战争洗礼下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流趋势(抗日与民主),把握准确牢固。书中说明,哪个政治集团对抗日与民主的关系处理得好,它就会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反之,它将为历史所抛弃。作者指出:国民党丧失领导中国社会前进的历史地位,是它本身的独裁腐败所决定的。作为中华民族先进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武装力量,在战争中都有很大发展,政治威望空前提高;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不仅是全国抗日的模范,也是全国民主的模范,新中国的雏形。所有这些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迅速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以上所写主要是介绍《中国抗日战争史》一书的特点和优点。但不论是优点或缺点,肯定有不全不周之处,仅供讨论。我认为,把这部三卷本的《中国抗日战争史》巨著,当作抗日战争史研究历程中的一个阶段性的成果,总是可以释然了。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